

外论评介

“小集团思维”： 外交政策分析的特殊模式

张清敏

[摘要] “小集团思维(Groupthink)”是外交决策过程中的特殊现象,也是外交政策分析的特殊模式。它指一个“内聚的小组下意识地产生一些共同的幻觉,以及干预批评性思考和经得起考验的规范来保持一种集体精神,最终导致不科学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政策实施的失败。本文介绍这一模式提出的过程,基本假设,适用的普遍性,诊断指标,预防措施和最新发展。

[关键词] 外交政策分析;外交决策;政治心理学;比较外交政策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4)02-0074-78

阿利森(Allison)的三个模式,以及官僚政治对外交决策结果的影响,是研究外交政策的人士比较关注的模式。实际上许多决策,特别是重要的外交决策都是由最高领导层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做出的,这种决策环境常常会产生一种氛围,压抑或限制着小组成员,使决策小组不对决策环境进行客观的分析,导致错误的决策和政策最终的失败。耶鲁大学教授简尼斯(Irving Janis)通过对1961年美国操纵古巴流亡者入侵古巴决策过程的研究,揭示了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这种特殊现象,提出了“小集团思维(groupthink)”模式,为外交政策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1]

一、美国入侵古巴的案例

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美国召集了一批古巴流亡者,把他们集中到危地马拉进行训练,计划派他们回古巴推翻卡斯特罗政府。民主党的肯尼迪政府上台后同意了决定,在美国军队的协助下,1400古巴流亡分子于1961年4月17日在古巴猪湾(基隆滩)秘密登陆。结果失败,除200人被打死外,其余入侵者全部被俘。美国最后拿出5300万美元赎回被俘者。肯尼迪决策小组的成员无不有着辉煌的经历,是精英中的精英,在美国外交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愚蠢的决定呢?简尼斯认为肯尼迪政府决策小组对形势的一系列错误估计导致了政策失败,这些估计包括:

第一,古巴流亡者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古巴登陆,没有人会知道美国与此事有牵连。实际上在入侵之前已经有舆论报道美国在迈阿密征召古巴流亡分子的细节和在危地马拉训练他们的“秘密”。

第二,古巴的空军落后,美国陈旧的B-26轰炸机在行动前就足以摧毁古巴的军用飞机。但由于B-26是二战期间使用的轰炸机,能力有限,出动了一次就陷入了混乱,此后的轰炸被迫取消。

第三,入侵者斗志高昂,急于推翻卡斯特罗政府。而实际情况是,这些人仅有的一点点士气也是由中央情报局的一个个骗局所建立起来的,在计划执行期间流亡者不断逃亡或者反抗训练他们的中情局成员。

第四,认为古巴军队很弱,很小一队人就可可在古巴的海滩上建立一个坚固的堡垒。结果是,古巴军队反应迅速有力,2万装备精良的古巴军队在入侵者登陆的第二天就包围了他们。

第五,这次入侵会引起古巴地下反政府组织的起义,并将有力地支持这次入侵。实际上一年前古巴举行的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古巴人支持卡斯特罗。

第六,如果这次军事行动没有成功,入侵者可以撤退到艾斯堪布雷(Escambray)山,化整为零进行长期反对卡斯特罗的游击战。但入侵失败后肯尼迪的决策小组才明白,中情局最初把入侵地点选择在艾斯堪布雷山脚下的特立尼达(Trinidad),如果入侵失败,可向山上撤退。后来考虑到特立尼达太显眼,把入侵地点改

变到猪湾。艾斯堪布雷山距猪湾 80 多英里,中间是地形复杂的沼泽和热带丛林。但是在决策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成员查看一下古巴地图。

参与决策过程的人事后认为造成以上错误的原因主要有四个,这也是肯尼迪政府事后的解释。第一,当时肯尼迪政府主要是从政治方面考虑这一问题的,即这件事考验的是,民主党政府是否和前共和党政府一样,愿意帮助古巴的流亡者反对古巴的共产主义政权。第二,新政府接收了旧官僚。入侵古巴的决定是肯尼迪政府成立之初做出的,政府成员之间还不熟悉。第三,团结到把专家排斥在外的程度。第四,政策制定小组内的成员认为自己的直率会威胁个人的声誉和地位以及政治影响,不敢反对这一政策。

简尼斯认为,如果肯尼迪政府的决策者们只碰了一次头就做出了这个决定,这四个解释是完全可信的。但他们对此决定考虑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多次开会。简尼斯以政治科学家的视角探讨了导致肯尼迪政府入侵古巴猪湾的决定失败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小集团思维的概念:“任何一个内聚的小组下意识产生一些共同的幻觉,以及干预批评性思考和经得起考验的规范来保持一种集体精神(esprit de corps)。”^[2]即政策制定群体对小集团内部团结的追求超过对合理政策结果的追求,因担心小组的分裂或担心自己被看成与其它小组成员不一致,不愿意,或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以致于不能对客观现实进行充分的估计。一旦形成这种气氛,决策小组就不能对应当考虑的政策选择都进行考虑,最终导致不科学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政策实施的失败。他提出小集团思维主要存在以下症状。

第一,认为自己坚不可摧的错觉。一旦自信导致了狂热,小组在做出决策过程中,就会出现两个体现小集团思维的主题:我们是由好人组成的一个群体,最终是会取得胜利的;我们的对手是愚蠢的、羸弱的坏蛋;即把自己当作道德和正义的化身加以美化;把对手妖魔化。在肯尼迪政府决策过程中,卡斯特罗就被认为是一个虚弱的“歇斯底里”的领导,其军队的军心不稳,个个都想逃走。

第二,决策小组没有分歧的错觉。这种错觉完全是由于主要成员们没有提出他们的想法,或模糊的沉默所造成的一种幻觉(illusion)。尽管每个人的设想和考虑都是不同的,但正如索伦森回忆说,“在所有的重要会议中,没有人提出任何反对的声音,也没有人提出任何现实的别的选择的可能”。施莱辛格则说,“如果有一个高级顾问反对这一冒险行为,我相信肯尼迪就

可能将之取消。但没有人反对它。”^[3]因为没有人提出任何异议,那么沉默就意味着同意。

第三,压制个人的怀疑。一些直率的小组成员因为担心失去同事的信任变得沉默。如在入侵猪湾的决策过程中无论是在国务院,还是在白宫都并非没有不同意见,但问题是由于担心被同事认为对共产主义“软弱”,或胆小,都没有提出来。

第四,有人锐身自任“思想保镖(mindguard)”。在内聚的决策小组内,一些成员通过对想发表不同意见的成员施加压力,敦促他们保持沉默。如当罗伯特·肯尼迪得知施莱辛格有不同看法后对他说,“你也许是对的,你也许是错的,但是总统主意已定,不要再难为他了。现在是每个人都帮助他的时候。”简尼斯认为罗伯特·肯尼迪扮演了一个“自任的思想保镖”的角色。^[4]就像身体保镖(bodyguard)的任务是保护总统和其他高级领导人的身体安全不受损害一样,一个思想保镖的任务是保持小组成员对小组已经承诺或者将要承诺的政策有信心。国务卿腊斯克也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第五,有威望的领导纵容一种意见或驯服小组氛围。促成小组成员产生错觉的压力有时候是由主要领导的行为所造成的,这些行为使那些对政策有怀疑的成员感到很难提出批评性的建议或其它的选择。

第六,不愿意得罪有价值新成员的禁忌。中央情报局正副局长杜勒斯和比赛尔都是前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旧员,但是他们被看作这个小组的重要成员,受到其他成员的尊重。小组成员都知道比赛尔为了这次入侵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精心的准备,杜勒斯也决心坚定,因此都避免显示出对他们存在敌意。

二、小集团思维模式及其普遍性

在对美国入侵古巴的决策研究后,简尼斯以同样的视角对美国外交史上其它重大决策进行了研究。他发现从入侵猪湾到干涉朝战,从二战中珍珠港遭偷袭,再到越战等等,所有这些外交上的失策都是由于小集团思维作祟。一些成功,如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处理,战后在欧洲实行的马歇尔计划等,就在于政策的制定者克服了小集团思维综合症的影响。此外他还提出尼克松政府时期对水门事件掩盖的失败,1980年卡特政府营救伊朗人质,以及1981年里根政府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就消减社会福利等政策的失败,其决策过程都有小集团思维症状。在此基础上,简尼斯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总结,并把小集团思维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对小组力量和道德过高估计造成的。包

括小组大部分或全部成员都认为自己的力量无懈可击,这种幻觉产生了过分的乐观,鼓励小组采取过于冒险的行为;或者对自己小组道德上的正确坚信不疑,忽视决策可能造成的种族和道德上的后果。

第二种,小组闭塞所造成的。为了使决策理性化,不考虑可能导致对最初设想重新思考的警告或信息;对敌方的领导有一种成见,认为他们太坏不会有真正谈判的愿望,或者认为他们太弱或太愚蠢。

第三种,保持团结一致的压力所造成的。如每个成员都认为自己的怀疑或反对意见不重要;认为小组成员大部分观点都是一致的;有成员锐身自任“思想保镖”,压制有反对意见的小组成员等。

如果一个决策小组显示出以上三种类型中的大部分或所有症状,决策小组对于一致性的追求就会导致以下后果。(1) 不考虑所有的政策选项;(2) 对政策的目标不进行充分和足够的考虑和分析;(3) 不研究倾向性的政策可能的危险和后果;(4) 不对最初拒绝的政策选择进行再次评估;(5) 获得的信息不够;(6) 在处理手头有限的信息时存在偏见;(7) 不考虑如果决策失败需要的补救措施等。

但是,小集团思维并非决策失败的充要条件。换句话说,小集团思维并不一定都会造成外交政策的失败,而大多数失败也都不是由于小集团思维所造成的。人们所熟悉的官僚政治更容易造成外交政策的非理性;具有一定权威的领导人单独做出的决策也可能会导致外交政策的失败;决策小组以外的政策落实者对政策落实不力,或者是由于决策者所预想不到的偶然事件,或者是由于运气不佳等,都可能造成决策的失败。小集团思维并非存在于一切决策小组,其存在有一系列前提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小组的内聚程度(cohesiveness)。另外两个条件,一是管理方面的,包括决策小组与外界隔绝,以及缺乏公平的不偏不倚的领导传统。前者会使成员不能从政府其他部门那里获得专家意见和批评性信息;后者则会导致决策小组的领导人使用自己的威望、权利影响决策小组的其他成员赞同他(她)的政策选择。另一个则是程序方面的,即小组在决策时缺乏方法和程序上的规范。这些条件在小组就某一问题做出决策之前都是存在的,因此小集团思维现象是完全可以预测的。^[5]简尼斯指出,小集团思维的核心可以用一个帕金森定律(Parkinson law)来概括:决策小组内部成员的关系越好,独立、批评性的思考越有可能被小集团思维所取代,导致对小组以外的人采取非理性和非人道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6]

当然,小集团思维决非美国所特有的现象。简尼斯指出,他之所以选择美国的决策进行研究完全是由于他研究的是美国政治,参考的都是美国政治科学家成果的偶然。他认为,如果能获得足够的证据和信息,他可以找到从古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邦,再到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很多小集团思维影响决策的事例。但相比较而言,简尼斯指出,“在众多的美国政府的各委员会所做出的政策决定中,小集团思维的倾向足以对三分之一的决策的质量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在欧洲国家平均比例可能只有(美国)一半,即每六个决策中有一个。”^[7]但并非小集团思维在欧洲很少存在,或不重要,实际上在欧洲历史上许多重大决策都受到小集团思维的负面影响。如1914年,法国领导人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忽视了德国迂回包围的危险和不断得到的消息和警告,结果德国军队避开法国军队的主力实施从比利时发动突然袭击。另一个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张伯伦反战内阁的“核心圈子(inner circle)”所推行绥靖政策也是小集团思维的结果。此外,埃及政府1967年挑起六天战争的决定、巴基斯坦政府1971年挑起导致巴基斯坦分裂的与印度战争的决定,以及造成1973年以色列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时没有经过充分准备的结果等,都是由小集团思维所造成。

当然小集团思维并非不可避免,其预防措施包括。(1) 政策制定小组的领导应该鼓励小组重视并提出不同意见和怀疑。(2) 最高领导应该采取公平的态度,而不是一开始就表明自己的喜好和希望。(3) 决策小组应该就一个政策设立几个独立的政策计划和评估小组,每一个小组都在不同领导的带领下单独思考。(4) 政策制定小组的成员应该时不时地与同一单位他(她)自己信任的同事或朋友一起讨论小组的意见,然后把他们的反应汇报给小组。(5) 应该邀请不是决策小组成员的一个或多个局外的专家或者机构内部有资格的同事交错参加会议,鼓励他们对小组的意见提出挑战。(6) 在决策过程中至少应该有一个成员充当敌人的辩护者的角色。(7) 应该花费相当的时间探讨对手发出的所有警告性信号。(8) 在政策决定后,决策小组应该“再一次”召开会议,对整个问题思考再三等。

三、小集团思维模式批判和发展

简尼斯所揭示的现象,以往多是工商管理所关注的现象,如公司董事会因为对市场形势的错误估计,做出错误的决定导致公司的破产或赔本等。简尼斯用之

于外交决策,并提出一个研究外交决策的模式,被认为是“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研究小组作用的一个转折点”,小集团思维很快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和管理学教科书中一个常用的概念和专有名词,简尼斯的名字因此常常与小集团思维联系在一起。^[8]简尼斯本人继续对小组决策模式进行研究,十年后他的专著被补充修订再版,后来他把这一模式的研究扩大运用到一般行政部门的决策。并带动更多的学者对决策过程中的这一现象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不仅又有学者将小集团思维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出版以此命名的专著,^[9]更多的学者则试图对简尼斯提出的原则进行实证的检验或试图进行改进。如亚历山大·乔治提出了与简尼斯类似的预防小集团思维的措施,包括决策小组一定要保证获得足够的信息;必须考虑到可能受到政策结果影响的所有价值和利益;尽可能广泛地寻求可能的政策选择,对每一个政策选项都进行深入的分析;充分考虑落实政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始终以开放的态度接受新的信息,一旦现行政策不合适,进展不够顺利,应当有记取经验教训的能力等。^[10]后来对决策过程这种特有现象感兴趣的学者还建立了一个跨国家的被称为“小集团积极性(small group initiative)”的组织,并在美、欧、以及大洋洲多次举行工作组和学术会议,探讨小组决策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的关系。

简尼斯提出的小集团思维模式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得到了高度评价和赞扬。但是,这一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最初的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对有关内容的定性上。如什么才是内聚(cohesive)的决策小组?客观的判断是困难的。如果一个决策小组是内聚的,那么多长时间才可能有小集团思维的症状?为什么一个决策小组在某一个时间的某一个决策中是内聚的(如肯尼迪政府入侵猪湾的决策),而在另一个时间的另一个决策过程中则没有这样的症状(如肯尼迪政府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决策)。其次,什么样的政策结果才叫失败。有时候,这一标准是非常清楚的。如卡特政府营救伊朗人质的政策被普遍认为是失败的。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标准很难判断。分析者可能将政策所达到的目标与结果进行比较从而做出判断,政策的一部分失败了,但另一个部分则可能是成功的。而大部分人则可能根据自己的标准和知觉判断一个政策成功与否。被一些人认为是成功的政策,在另一些人的眼里则可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如大部分人认为福特政府拯救被柬埔寨政府扣留的马亚圭子轮船的政策是一个胜利,而简尼斯则认为这是一个失败。^[11]再者,对

外交决策过程中小集团思维的研究和对官僚政治的研究一样,都存在着一个资料获得困难的问题。相对而言,由于小集团思维的内聚性,对其研究所需要的信息更加难以获得。

此外,小集团思维模式与外交决策过程中官僚政治模式是完全矛盾的。但是研究官僚政治的经典之作,汉普林的《外交政策和官僚政治》和简尼斯的《小集团思维》所运用案例都是从二战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外交决策的案例,两人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所刻画的现象在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几乎都是无处不在的。但他们所描述的现象不可能存在于同一个外交决策中,因为他们描述了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两个极端——前者给人们的印象是,从二战结束到越南战争,美国主要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都或多或少受到互相扯皮和讨价还价的官僚间政治斗争的影响。^[12]后者给人的印象则是,几乎在同一时期,在一些重大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都受到小集团思维的制约和影响。在同一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如果汉普林所说的官僚政治是存在的,那么就不可能有小集团思维现象的存在,反之亦然。

针对这些问题,“小集团积极性”组织于1995年出版的《超越小集团思维》反映了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本书的三位编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其作者或者是研究外交政策的领军人物,或者多年来一直对外交决策过程中小集团思维现象进行研究。他们在高度评价简尼斯的理论贡献的同时指出,如果粗略地阅读一下关于外交决策的教科书就会发现,如果有关于外交决策的内容,基本都由小集团思维所主导了,把小组决策(small group decision-making)与小集团思维(group-think)等同一回事了,“这太简单化了,忽视了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多种多样决策小组和过程”。因此他们提出“应该把小集团思维当作一种偶然的现象,而不应该把它看作是高层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一个具有共性的问题”。^[13]其中不少作者应用简尼斯在提出小集团思维这一模式时所运用的相同案例试图对这一模式的不足进行改进。

此外,他们对小集团思维症状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以及简尼斯提出的避免小集团思维症状建议的积极作用,以及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提出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决策过程既可能有官僚政治斗争,也可能存在小集团思维,对两者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如在官僚政治斗争中,决策成员因为怕或不愿承担责任,保持沉默,也会导致

小组决策过程出现小集团思维的状况。因此两种模式是密不可分的,无论运用那一模式,都应当考虑决策的环境(context)。一方面小集团思维存在的范围要广泛得多,不仅在最高决策层存在,而且存在于决策各个环节;另一方面,在研究小集团思维的过程中不仅要注意其偶然性而且要特别注意其存在的政治上的、机制上的,乃至文化上的环境。如他们在简尼斯小集团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小组症状(new group syndrome)”的概念,即“在一个新成立的或临时性的决策小组,由于缺乏稳定的规范、角色和地位结构,导致成员的不确定性和对主要领导人或小组活跃成员的依赖,以及对决策过程协调性的困难,‘更容易导致小集团思维症状的产生。^[14]此外他们就小集团思维的适应性及其与现实外交决策的相关性等问题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进一步提炼和完善了研究和分析外交决策的小集团思维这一模式。笔者在学习这一决策模式时,一直思考的是,小集团思维是否存在于并影响自己感兴趣的其它决策。简尼斯不是中国问题专家,其著作中没有任何关于中国的内容,《超越小集团思维》也没有中国的内容。但笔者深信,由于不同的原因,小集团思维症状和官僚政治一样在中国外交或其它决策过程中是同样普遍存在的,只是缺乏足够的信息和材料,还没有这方面的研究。但只要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对文革的普遍批判和否定态度,与文革期间人人积极投入、惟恐落后的激情相比较,不难看出整个文革期间,中国社会都被一种小集团思维症状所困惑。对学者来说,掌握这一模式可以拓宽视野,增加一个研究外交决策的视角;对于决策者来说,了解这一模式,特别是其诊断指标和预防措施为避免小集团思维对决策过程和结果的消极影响,增加决策的科学化,避免政策失误都是非常有益的。

作者简介:张清敏,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北京,100037)

收稿日期:2003-12-14

修改日期:2004-01-13

[注释]

- [1] Irving L. Janis, *Victims of Groupthink: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and Fiasco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2). 本文仍据其十年后的再版 *Groupthink: Psychological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and Fiasco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2).
- [2] Janis, *Groupthink*, p. 33.
- [3] Janis, *Groupthink*, p. 39.
- [4] Janis, *Groupthink*, p. 42.
- [5] Janis, *Groupthink*, pp. 176-177.
- [6] Janis, *Groupthink*, p. 13.
- [7] Janis, *Groupthink*, p. 186.
- [8] Paul 't Hart, Eric K. Stern and Bengt Sundelius eds., *Beyond Groupthink: Political Group Dynamics and Foreign Policy-making*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p. 10.
- [9] Paul 't Hart, *Groupthink in Government: A Study of Small Groups and Policy Failure*, (Amsterdam: Swets and Zeitlinger, 1990/1994).
- [10] Alexander George, *Presidential Decision-making in Foreign Policy: The Effectiv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Advic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0), p10.
- [11] 一般人不认为这是一场失败,但简尼斯认为,美国为了援救40名船员,死亡了41人,伤50人,特别是就在美国派出军队援救前几分钟,柬埔寨政府已经宣布它将释放被扣留的美国轮船和船员。1976年10月,美国总会计室(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公布了一份报告,认为福特政府的外交决策是一个很大的失误,整个行动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与柬埔寨政府的谈判可能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就顺利地解决这一问题。
- [12] Morton H. Halperin,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4).
- [13] Paul 't Hart et. al. eds., *Beyond Groupthink*, pp. 11-12.
- [14] Paul 't Hart et. al. eds., *Beyond Groupthink*, p. 132.

Country and Region

51 **The Honor and Dream of A Great Power :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French Diplomacy** by *Ma Shengli*

Ever since the French Revolution , the French nation has formed a political tradition to of assuming global responsibility. This universalism has the property of both revolution and aggressiveness. “ a Great Power ” is a long lasting dream of the French , to maintain the great power status has become focus in the French Diplomacy. During the Cold War era , General de Gaulle had successfully strengthened French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Now ,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 can France and how will France realize its dream of a great power ?

58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in German Foreign Policy Making** by *Yan Jin*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in Germany are NGOs that have close relations with political parties and government offices , and play an important and special role in German foreign policy making. They have the following main functions to play : sensitive political forewarning system , reliable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professional advisory institution. They are not only actors but also the instruments in German foreign relations.

64 **An Analysis of the Latest Change of Social Class Structure in the USA** by *Zhao Yi*

By the analysis of the widened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 and the worsening state of the middle class in the USA , the writer concludes that in the American society a new polarization has taken place. The rich is becoming richer while the poor poorer. Therefore , the social structure is a cone shape like the pyramids in Egypt. The writer finds that two reasons have caused the situation. One is the rising of neoliberalism since the end of 1970s , the other is that US economy is undergoing a structural change.

World Economy

68 **The ACP-EU Negotiations on New Trade Arrangements and Their Influences upo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by *Zheng Xianwu*

Based on The Cotonou Agreement ,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ACP-EU new reciprocal trade arrangements , which include compatibility with WTO rules , incorporating trade cooperation into development strategies , basing trade cooperation 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cess , the plural actors of trade partnership , trade cooper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 and the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of countrie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development. Then , it outlines the progres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two sides at the negotiations on the new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It analyses possibl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itiatives , participation in WTO multilateral trade liberalization , and practice of the export-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he end , it suggest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correctly deal with it by employing both multilateral and regional trade cooperation policy.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Works

73 **Groupthink : A Special Model for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by *Zhang Qingmin*

Groupthink is a special phenomena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 and also a model of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t refers to “ a mode of thinking that people engage in when they are deeply involved in a cohesive ingroup , when the members’ strivings for unanimity override their motivation to realistically appraise alternative courses of action. ” This essay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model , its basic assumption , prevalence , symptoms , prescriptions , and recent development.